

芬 兰 史

〔美〕约翰·亨·伍里宁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 035 4331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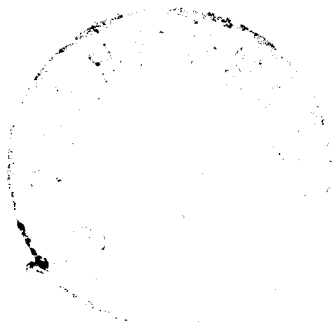
芬 兰 史

上 册

〔美〕约翰·亨·伍里宁著

武汉大学《芬兰史》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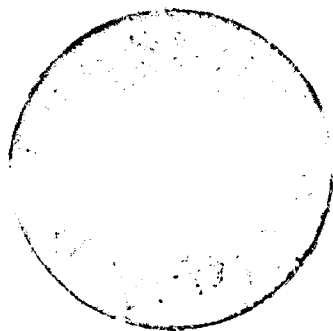


芬 兰 史

中 册

〔美〕约翰·亨·伍里宁著

武汉大学《芬兰史》翻译组译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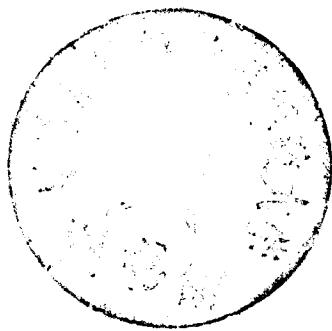
2 035 4333 5

芬 兰 史

下 册

〔美〕约翰·亨·伍里宁著

武汉大学《芬兰史》翻译组译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John H. Wuorinen
A HISTORY OF FINL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65

根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5年版译出

芬 兰 史

(上、中、下册)

[美]约翰·亨·伍里宁著
武汉大学《芬兰史》翻译组译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7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0
统一书号：11106·97 定价：2.68元

内 部 读 物

6-10-75

出版说明

《芬兰史》作者约翰·亨·伍里宁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教授。1897年生于芬兰的瓦沙，后来移居美国，193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4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9—1958年间任历史系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和分析处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组的顾问和组长。他是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的董事。在过去几十年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政府的资助下，曾多次访问芬兰、瑞典等国，是芬兰科学院的通信研究员，曾获芬兰政府的勋章和赫尔辛基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在《芬兰史》出版以前，他曾发表许多有关芬兰历史的论著，计有《特拉华河畔的芬兰人》（1938年），《近代芬兰的民族主义》（1931年），《芬兰的禁酒尝试》（1931年）和《芬兰与1939—1944年间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1948 年编译)。

作者自称在三十多年前就着手写这部《芬兰史》，但到六十年代的最初几年才把这本书的大部分写出来。全书于 1964 年定稿，1965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为美国一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出版。本书即根据这个版本译出。全书叙述从早期起到现代(到 1962 年为止，在个别地方还提到 1963 年或 1964 年初的情况)的芬兰历史，其中关于近代和现代部分所占的篇幅较多，虽然有些繁琐庞杂，详略不当，但对内政、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不少具体的材料，可供了解或研究芬兰问题的参考。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芬兰虽是小国(据 1970 年调查，人口有四百七十万)，但芬兰人民在过去几百年间对人类文化是有贡献的。列宁在 1918 年初曾称誉芬兰为“**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优良的经营制度和光辉历史的国家**”。因此，芬兰的历史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且，从整个世界近代和现代史看，关于民族自决问题，小国与大国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右翼社会民主党集团的破坏作用问

题等，芬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例证，值得好好地加以分析和研究。本书虽不能满足这些方面的需要，但由于目前国内外关于芬兰通史的专著比较缺乏，本书仍然值得介绍给读者一阅。

但必须指出，作者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辩护士。他是站在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史观来写这部历史的。书中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问题，例如关于封建时代占有情况和阶级关系提供的材料较少；在叙述芬兰经济发展的几章中，也看不清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对外国资本的侵入几乎没有谈到；而为了美化芬兰资本主义制度和芬兰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为芬兰反动派辩护，作者竭力掩盖芬兰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否认垄断资本的统治（例如否认“木材大王”的存在，见第十章第443—444页），把芬兰说成是“一个劳动者的共和国”（见第一章第40页）；还与芬兰反动派一唱一和，把1918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血腥镇压别有用心地称作“一场独立战争”，掩饰1919年早期芬兰反动派参加十四国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有意隐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法西斯势力的嚣张情况以及芬兰反

动政府与希特勒德国的勾结关系等等。书中还大量散播对工人阶级、对共产党、对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恶毒诽谤和诬蔑，并无耻地吹捧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推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于所有这些反动论调，我们除了个别地方的译者注中加以揭露和驳斥外，一般未加批判，相信读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会正确对待的。我们认为本书在很多方面可以作为反面教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是如何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

在译文中，我们对原书中所用的字眼如“阶级”(class)，“农民”(peasant)，“右派”(rightist)或“左派”(leftist)等，均照字面译出，虽然这些字眼在原书中使用时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定义或习惯用法的。对于有些名词，我们避免用国内通行的字眼译出，而另用较适合作者资产阶级观点的字眼，如“revolt”一字，译作“暴动”(第八章)或“武装反抗”，而不译“起义”；“reds”译作“赤色分子”或“赤色军队”而不译“红军”。对于同一事物，作者在行文中有时使用不同字眼，如对

“社会民主党”，有时称作“社会党”，我们均照原文译出。又如“苏联”和“苏联人”，作者有时称“俄国”和“俄国人”，我们也照原文译出。书中还大量用美元(dollar)作为计值单位，为了简略起见，我们都译为“元”。

附录中的条约都是英译本，作者没有说明这些文本的来源。我们基本上照这些英译本译出(并参照世界知识社出版的《国际条约集》上所载的译文)。我们没有看到原条约的芬兰文本、俄文本或法文本，故这里所载的译文，仅供参考，不能作为正式依据。

人名、地名、和专门名称译法与原文的对照，见本书最后所附的“索引”，我们不另编“译名对照表”。

序 言

vii

本书叙述了十九世纪以前许多世纪里芬兰还是瑞典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时的地位和历史的一些主要方面；提供了从1808—1809年到1917年这一百一十年间芬兰同俄国合并时期作为一个自治立宪国家的概况；探讨了1917—1918年间芬兰取得独立的经过，1919—1939年间芬兰共和国的成长，以及芬兰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和后果；并勾画出1945年以来芬兰发展的轮廓。

本书对芬兰历史的叙述没有越出一般的政治、经济和(1918年以后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范围。其所以要选择过去记载中的这些方面来进行叙述和评论，是因为这些方面是芬兰人历史中最基本的东西，而且题材丰富，足以写成一部专题著作。实际上，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如此广泛，以致在叙述时也不得不严加限制。因此，很遗憾，由于篇幅上的考虑，不得不将民族和文化

的发展及其有关的某些重要方面加以省略，其中包括文学和艺术。

人们往往认为，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了“适当的”看法之后，对过去历史的研究才能作出成绩。不管怎样，钻研外交史的历史学家，举例来说，通常总要被迫等待几十年才能接触到过去的纪录。国家的文件和其他必要的卷宗常常被密藏在档案室或其他库房中，使研究人员在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无法看到。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使历史学家在适当的时候能有一种“较好”的看法，而是对被认为需要保密的事情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现的、可供学者们利用的丰富文献或是希特勒德国崩溃后所获得的德国的大量资料仅属例外，它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表明通常对研究人员的限制已经消除了。

这就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学家在研究 1939 年以前芬兰的对外关系和 1939 年以后它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时是否受到阻碍或严重限制？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是很有针对性的。1945 年以来有些芬兰作者认为或含蓄地说，对这些年

代中的复杂事件进行确切论述的时候尚未到来。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只能看作是一些学究，他们空言喋喋而无定见，这不能不使人推测：他们其实是在寻找迂回的道路以避免他们觉得棘手的问题。另外一些人则是些专门的辩护士，他们暗示或试图证明，人们把 1939 年前的芬兰看成是对苏联的一种威胁，是有相当理由的，而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仅仅出于安全的考虑在 1939 年 11 月间向芬兰进攻的缘故。因此，他们认为：在“证据齐全”以前，不可能对这场战争的背景及其后果作出最后的和确实可靠的判断。

这些解释或说法必须立即摒弃。它们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它们是由一些惯于用文不对题的材料来歪曲事实的作者或贩卖捏造的史实或更坏的货色的市侩所提出来的。关于 1939 年以前芬兰的外交政策以及在苏联的军事行动把战争强加给这个国家以后芬兰所处的地位的种种事实，并没有给历史学家带来异乎寻常的困难。事实已经显现得很清楚，足以为研究 1939—1945 年的事态提供可靠的指针。所以，历史学家不需要等待那种所谓由于时间的推移终将提供出来的“较妥善的”

看法。对历史学家说来，基本的东西随手可得，只要加以利用就行了。

我毫不踌躇地利用了这些资料。其结果见于 ix 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前者综述了 1939 年以前芬兰的对外关系，后者探讨了苏联进攻芬兰前的形势并概括了那次战争的后果。就芬兰而论，根据证据所得的结论是：1939 年的侵略对照表只有一个户头，就是苏联的侵略。如果忽视这个事实，就是回避不偏不倚的要求，破坏为正确观察战争的结果所必需的焦点。

本书的写作开始于三十多年前，但在过去两年中，才写完大部分并确定了全书的结构。哥伦比亚大学授与我的威廉·贝阿德·卡廷旅行研究费，不仅使我能够发表一部专著《近代芬兰的民族主义》，而且还给我一个考察芬兰历史的其他方面的机会。哥伦比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补助金使我能在斯堪的纳维亚从事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从而获得本书所采用的很多资料。国务院富布赖特的“参与美国国际教育交流计划”的资助，使我有可能是于 1959 年在芬兰度过两个月，并直接了解这个国家 1945 年以后的某些情况。

我要对好几位学者表示感谢。有些人的著作使我受益特别大，有些人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在不同时间给我以种种的个人帮助。在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之余，我要特别提出下列名字，至于我对他们铭感的深度，就不再缕述了：《美国—斯堪的纳维亚评论》编辑埃里克·伊·弗里斯先生；赫尔辛基外交部的马克斯·雅各布森先生；赫尔辛基大学的马提·累波教授，耳·阿·蓬提拉教授，彭提·伦伐耳教授和海基·瓦里斯教授；赫尔辛基工商管理研究院院长布鲁诺·苏维兰塔；赫尔辛基议会图书馆馆长亨里克·晓曼博士。对于我的同事谢泼德·布·克拉夫和我以前同事、现任昆斯学院教务长哈罗德·克·赛雷特在准备本书的初期所给予的襄助，我要再次表示谢忱。我受克劳斯·托努德博士之惠尤多。他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本书全部的手稿，改正了其中不少错误，^x并促使我对许多概括性的论断表达得更清楚些。不论上述人士或者是我在写作本书时所曾引为依据的其他人士，对于我可能被指责的任何解释上的错误或应写而未写或不应写而写的过失，都没有任何责任。

我还要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特别是对本书的编辑威廉·弗·伯恩哈特先生，表示感谢。他的不辞辛劳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大大地改进了原稿。在成年累月的写作中，我的妻子在许多方面帮助了我。这部历史归功于她的地方很多，所以，把本书献给她，不仅是出于我的敬意，而且也是她份所应得的。

约翰·亨·伍里宁

1964年11月21日于哥伦比亚大学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国土与人民	1
国土	1
人民	11
现代的国家	34
第二章 中世纪的芬兰	44
早期的定居	48
1157 年的“十字军”	51
教会及其领导人	62
乡村和城市	71
作为瑞典一部分的芬兰	78
政府和行政	84
卡耳马联盟	89
第三章 近代初期的芬兰(1521—1808年)	101
古斯塔夫·瓦萨与宗教改革	101
1734 年前政府和法律的趋向	111
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的农民	126
战争及其后果	147